

国外人类学

(一)

中国人类学学会编印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

目 录

一、人类学——“人的研究”	1—55
二、英国的人类学	56—84
三、美国的人类学	85—116

一、人类学——“人的研究”

这个辞目下面的六篇文章主要是叙述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和应用人类学的。其他的人类学分支可在考古学，语言学和体质人类学等标题下述及。与此有关的项目有经济人类学，民族志，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和政治人类学。人类学的主要概念的历史表明它可能是建立在生态学、种族起源学、亲属、种族和社会结构等基础之上的。

I 范围

约瑟夫·H·格林伯格

II 文化人类学

戴维·G·曼德尔鲍姆

III 社会人类学

雷蒙德·弗思

IV 应用人类学

露西·梅尔

• V 当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

沃尔特·戈德施米特

• VI 人类学的比较法

埃德蒙·R·利奇

I 范 围

人类学，它的名称从词源学上来说是“人的研究”——它是关于人类研究最全面的学科群。全面性在于它与整个人类社会的地理学的和年代学的范围相关联；与其主要的探索领域，包括语言、社会结构、美术和信仰体系等相关联。事

•注：标题是编者加的，以下的“范围”，“文化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应用人类学”均选自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1968年版第一册。“当代社会的人类学研究”、“人类学的比较法”，暂缺。

实上它是人类科学中唯一研究其体质的和社会文化的两个方面的学科。除了这些基本的生物学的和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外，人类学还在人文主义方面具有伟大意义，比如说，它着重研究不同居民在工艺学的美学价值的基点。

虽然人类学在原则上是包罗万象的，实际上它只是研究人类学科群其中的一个分支。的确，人类学钻研方面是丰富多彩和各式各样的，这样它不可避免地导致它渐变而来的许多小分支，实际所有这些分支还必须与其他已经完善地建立起来的和独立出去的研究领域一道共同划分它们的研究的主要问题。这样，人类学也很容易被看成这样一种研究：它的广大范围模糊了事实上还存在的主体。

这个明显的矛盾至少可以部分地得到解决；就问题和方法论来说，存在着某些规定了特别意义的集中点，并把人类学和其分支的基本主题区别开来。即使人类学在主题上和某些分支范围相一致，但它还是倾向于用略有不同的特殊资料，并就问题而言，也要用一般的观点来加以探讨。可以找出一套特殊的相互关联的问题来作为历史上的人类学注意的核心——也就是对人类民族集团相似性和相异性的描述和解释。这个，仅在人类学上一直是个中心问题，并因此用于以使人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相区别。而且，就这个历史上的主题来看，它还没有象那些在更广大范围内一再延续的主题那样被其他的问题所取代。

因为民族集团在体质形态和社会文化特点两个方面不同，所以，人类学一直与它的体质的和社会文化的分支有关。为了探索人类差异的整个范围，正要考查从固定历史传统里独立出来的社会使我们所认识的那些社会制度的最大差异，确保极重要的部分。还要考虑独立存在于历史上最大量的人

类社会组织的独立典型例子。尽管人类学在原则上经常同等重视各种各样的社会形态研究，但实际上，人类学总是集中于原始的或者说没有文字前的民族，绝大多数指的是那些在最初与西方接触的时候还没有文字记载的那些民族。许多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特点就是来自于这种成见。这个基本的描述方法，就是通过对于在一个部落内有代表性的组织作比较观察；其重点应在于质量，而不在于数量。民族志者试图以构成一幅前后相连的完整的情景，用观察得来的原始材料来研究重复的过程。

同样，考古学为了发掘传统的历史学缺少文字记载基本材料的，那些地区和阶段的过去社会的基本史实，考古学的技术就和其他推理方法结合起来（诸如用口头传说，民族学的特点分布和比较语言学）。

就人类种族不同而言，体质人类学和应用生物学的区分也是可以解释的。体质方面对于所有人类共同的东西，一直是关系到作为一般生物学一个专门分支的人类生物学，而体质人类学的传统任务也就是阐述和说明人类体质的差异。就其历史性来说，这也包含根据化石的证据（人类古生物学）复原人类过去的体形，正如考古学尽力去发现关于过去文化的史实一样。

按照这个中心问题，不仅主题和方法论，而且人类学推理所具有的更广泛的特点也都可以被理解的。因此，人类学的基本方法一直是比较法，象文化进化论和环境决定论这样的基本方法也是试图说明由于某些单一的变化所引起的文化相似性和相异性。

人类学着重点的重大改变可以追溯到比较最近一个时期，其开始年代大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着重点开始转向每

种文化的内部结构，虽然这种着重点在很大程度上是专门发掘每种文化独具的“特征”，但是比较的结构并没有完全被抛弃，它必然在更广阔的结构内加以结合，人类学者倾向于这样认为：应该调查所有文化的共性，以便构成人类的共性的那些所谓基本特征被我们认识。这个秩序问题能够用理论上的假设加以证明，这种假设就是：在所有的社会里，个人总是按照最高准则而被社会化了；遵守公共秩序。至于联系到社会内部功能的调查，只是个人与文化之间关系发展意义上的一种工具，即原来实际上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方面。

诚然，这些问题长久以来就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理论范围的焦点，但是，传统人类学的着重点的扩大包含了其理论观点，它在与其他分支之间协调方面是在空前规模地更大地发展起来。

最近一个时期，对于这种分支内部间应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把人类学的着重点扩大到与运用问题相联系起来，如都市的形式和文明社会。结果，人类学介入主要课题的某些区域（社区研究）和（功能学说）变成与社会学很难明显地划分了。然而，我们应该强调象史前考古学，没有文字的语言学和种族社会的民族志等，这是早已在传统人类学继续长期存在的普遍事实。

分支的再分及其内部关系

按照传统的美国体系，人类学经常分为四个基本的小分支，即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学。除此之外，社会人类学通常是在拉德克利夫—布朗和他的追随者组成的社会功能学派影响下的一个独立分支，他们明确地把社会结构和功能（社会人类学）和对于历史上固定下来的文化的描述分开。从两个分支的任何一支来看，这种划分在某些

方面，实践要比理论范畴多一些，这样用以解决训练学生成为博士的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因此，语言只是一个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这样，对于语言的研究很自然就成为文化人类学的一个小分支。考古学力图尽可能以史前民族遗物来复原他们的文化，重新建立这种文化的历史上的内部关系，因此，考古学也可以被认为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方面。然而，语言学 and 考古学两者都要求在高度专门化的技术方面，有相当可观的训练；在实践中，这就是把它们从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里分出来的基本原因。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的区分并不是对于人群行为的相同客观现象的两种不同探讨，实际上，这种区分消除了，因为人们没从学术上把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划分为两个不同的范围。

基于这种考虑，有些人也这样认为：正象在美国实践的那样，在人类学真正的基本划分是在把人类的体质研究（体质人类学）和人类的社会文化研究（保留的分支）加以划分。这种划分的基本特点在下面的事实里反映出来：除美国之外，“人类学”这个术语或者对这个术语的其他翻译（例如德国译为Anthropologie是表示美国的“体质人类学”，而“民族学”是表示对人类社会文化的研究。这种划分的意义又在于认识两者间的特殊关系，它反映在称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国际大会”这个定期国际会议组织里。

人类发展了文化这一事实，从纯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它引出了具有伟大意义的新的因素。用大多数的一般术语来说，人类——作为一个人种——其关键的相应结构，就是文化本身。体质人类学者就此有很多的实际推断。例如，在人类聚居的地方配偶方式是发生社会已定的模式内。这种认识使得人类学的体质和社会文化两个分支有效地、完整地结

合起来了。

许多标明过了的专门化范围，横切或以上列举的基本划法分得更小，并消除了人类学与各种分支或专门化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这里主要分为两个类型：地区性和典型性。例如：普通的人类学者，尽管他在这些主要的分支的某一个方面是专家，自己还是着重于某一个专门领域的具体工作。因此，一个考古学者很自然地对某些特别主要地区发生浓厚的兴趣，例如北美洲，而且经常就是在这一区域里，又会有专门的地方性研究，例如美国的西南部。这样的专门化就从地理学区划来划分的，但是，它要把倾向于共同区域研究的基本范围搞在一起。因此，那些设想的西南部考古学者就会感到，至少需要掌握该地区民族学和语言学的起码基本事实，以便去解释它的成果。在某种情况下，这将导致与其同行就其分支进行讨论，甚至充分协调他们之间的研究。

人类学在原则上与世界上各个地区均有关系，正如它 and 所有的社会类型——原始的、文明的或工业化——有关一样。但是，在实践上，人类学在它的各个分支里还是倾向于把它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地区，如大洋洲或土著美洲，在这里的社会，一直独立存在或者至少是非常明显地处于史前阶段。然而，人类学者越来越认识到：必须连同各分支可能研究的范围一并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忽略近东或远东工业化和文明社会，正象忽略史前社会一样的危险。在扩大它对包括有历史文献，有文字文明地域的注意力的时候，人类学必须沿着传统的，地区专门化来探讨。例如，对印度学、汉学和近东区域的研究。在后面提到的这些领域，专家用的方法很可能同人类学者的方法不同，因为人类学者更加强调语言学、人文主义、历史和专门化。文化人类学者和社会人类学者的着

重点是和典型性一同产生的，根据一般的社会理论来考虑，它还可能研究处于低级阶段的社会，因为象农村的研究最适于研究部落社会中发展起来的那种方法，因此，对两种专门研究人员都有用武之地。还有，每一种都从另外一种那里与自己的着重点和技术结合起来。因此，他们相异之处变得越来越小。

著作上相同的基本标准，构成了从事人类学的考古学者和近东考古学者的主要分界线——前者集中于搞史前的和古典的；而后者关心的是有文字的文化。同样，从事人类学的语言学者专门研究至今没有文字的语言，这里还带有用语言学田野考察的方法同时记载下来，但缺少具有传统语言技术的文字分析。

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专门化的另外一个主要基础是课题的。绝大多数人类学者倾向于把他们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局限于文化的这些专门的方面，如经济生活、政治、宗教或者音乐。这里人类学又一次地触及到已经很好地建立起来的分支，象经济学、政治学和音乐研究。然而，实际上所有这些都只注重按照西方的传统研究它的对象，所有这些课题里相对忽视的分支，而这些分支与非西方文化的比较政治学和比较经济学的这些课题有关。相反，尽管人类学声称要有一致的重点，但它还是倾向于集中地注意非西方的——特别是没有文字前的——社会。

在另外一方面，人类学也不同于标准的分支，它不仅研究非西方的文化环境的比较现象，而且研究符合于主题有关文化的又可以认识和有价值的方面。后者研究的这个分类，很可能包括社会科学以外的问题。例如，被叫做民族植物学的人类学专门项目就调查土著居民的植物知识。应用的着重

点就为这两个方面提供了一个极好的结合点。因此，涉及到医学活动规律的医学人类学，就把一个特定民族发生的各种疾病，归于它的生物和社会的因素，而且还研究当地诊断和治疗的理论，因为它们构成了文化环境，新的方法将被介绍到这个文化领域里来。

现在在社会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中特别流行的另外一种划分法，是集中和组织田野实地观察得到的资料的民族志，与利用这些材料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根据的民族学相分开。类似的划分法也存在于其他主要分支的题材里，例如描述语言学与理论语言学相对称。这些划分法不能与那些先头的描述法相比拟，因为实际上每个科学家都有相互作用的描述性和理论性的爱好，然而，每个人还是存在着对这方面或还是对那方面的偏重。

最后，人类学也可以分为理论分支和应用分支。人类学者始终认为：科学地研究人类的基本宗旨在于更好地了解 and 掌握人类本身和人类社会；另外一方面，并不象它的姊妹科学——社会学，它一直没有涉及到社会改革问题的理论方面。然而，它所着重研究的人类福利，也一直是人类学研究传统的一个部分。再者，由于西方国家拥有殖民地，一种应用人类学的形式发展起来了，但是，绝大部分是被受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行政人员所利用，而不是专门的人类学家所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于殖民地地方和国家的发展计划形式更深刻地发展起来了，特别是在新独立国家里，经常是牵连到在西方国家或者国际机构的协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活动唯独在实验方法论的方向上限制了人类学按照观察方法去作。虽然往往不是由人类学者来制定政策，而必须限定政策的条件。

历史

现代人类学是十九世纪的产物。这样的组织形式——第一个人类学团体的建立及在这个课题方面的第一个专科地确定——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但是，它的历史当然会长得多。就其十九世纪的特殊形式来说，人类学被这样一种思想束缚着：人类社会是由没有文化的状况循序渐进地发展起来的，而在没有文化的状态下，人类和其他动物没有什么基本的不同。这种文化进化论学说从达尔文学说的科学成果里得到巨大的推动力，这可追溯到“物种起源”出现的时候。但是，很清楚，十九世纪人类学基本组成部分是在非常早的时期发展起来的，并且从根本上脱离了生物理论。这些基本思想是：应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类的可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个）；抽象文化的概念本身可能是科学探索的对象——或者说所有社会上形成的习惯不同于体质的遗传（也是其中之一）；文化的概念经历了连续很长时间的渐进变化（也是其中之一）。

因为在其他领域的努力之中，希腊人首先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人类学古典的遗产是无法与历史学和政治学这些领域的遗产相比拟的。古代人按照记述的地方环境来发展民族学描述的模式。地理的著作也有关于体质人类学和地方习俗的事实和观察资料。这些描述的极一般而又较模糊的事实和详述发展了气候影响文化和生物种类的理论，就予示了现代地理学“宿命论”的出现。民族学对于文化差异的观察，提出了自然人类习俗与因袭人类习俗问题，提出了一致认为正当的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存在——这样一个独特的人类学哲学问题。后来，关于全面发展人类文化的各种理论都得到了探讨，例如，先前黄金时代的传统宗教信条、斯多葛派的循环

理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推论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地发展了人类遗产——从“芦克丽蒂丝”的有名的诗歌“事物的本质”里尤能看到这一点。原子论的推论这个学说可以被认为是文化进化论的先驱，而且在这里找出神学的退化论和不断发展的，科学制定的信仰间基本上相互对应的对立面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一点在十九世纪又一次地重申了。

下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是开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类学说，和十五、十六世纪的地理探索时期。这些发展以一种新的，重要的形式，对理智的风气作了贡献，就是在这种理智的风气里，现代人类学终究才得已发展。文艺复兴时期以这样一种观点——人类对它自己的现世的经历感兴趣，这不仅仅是为了为长久的今后作准备——给现世主义定了个现代的调子。人文主义者力图通过研究原始材料，而不是通过继承下来的中世纪场面去复原希腊和罗马世界，这样做能为他们提供对于文化差异的一种人类学全面看法。正象人文主义扩大了年代学视野一样，探索（新大陆）的航行扩大了空间的视野，于是，古代社会不知道的整个大陆的民族被发现了。这不仅提供以一种新的规模来收集事实的方法，而且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理论问题。探索（新大陆）所发现的人，与西方人类一样吗？这些有灵感的人值得拯救吗？正统的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人们难于从《创世纪》的系统表里加以证明。把美洲印第安人的存在，解释为十个消失了的部落的理论是受欢迎的，但是另外一些更大胆的人物臆断，那些残存的人口并不是亚当的后裔。因此，提出了关于人类起源的无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理论，而且这两种理论随后尖锐地相斗了几个世纪。许多理论家象这样设想：难道处于技术发展简单阶段的非西方民族，是在贫乏的政治法律制度起源之前的国家的代

表吗？或许，他们是代表了文化文明兴起前我们祖先的样子吗？下面这种观点后来非常流行，并在不断发展论里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在不断发展的理论能够站稳脚跟之前，那种认为古代世界优越于现代世界，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必须予以克服。这个工作在十七世纪业已完成。由于在物理学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牛顿的综合定理达到了顶点，世界至少在某一个方面，显示了比古代世界优越。斯威夫特在他的《书之战》里讽刺的“古代人和现代人之战”的区区小事下面存在着一个严重的问题。伯纳德·方坦尼尔在他的《古代人与现代人的不同》一文中，对文化的非积累方面如（文学）和积累方面如（科学）——加以区别。对于后者即科学，现代的人类要优越些。实际上，人类——粗略地估计——被比作由于年龄增大现在处于壮年时期的人。但是，根据方坦尼尔的理论，这种人类永久不会老，尽善尽美是可能的。

然而，牛顿学说做出了另外的贡献：在物质方面，在受客观规律制约的宇宙里，人类也不能例外，那么还是存在着沿着牛顿指出的道路走的问题；实际上，象吸引力这样的概念，在文字的应用上，在十八世纪和以后都是常见到的。

为了描述不断发展的整个过程，有必要做的是，把同时代的原始人当作古代东方和古典世界前的那个阶段的代表。这个步骤是特戈特在他的《关于世界历史两种研究的初步意见》里采用的，这是一部第一次说明三个连续的经济阶段——狩猎、畜牧和农业——的著作，这与后来的康姆特的《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的规律》——神学、玄学和科学——的基本形式一样。

十八世纪另外一部值得注意的著作是，克里斯托弗迈纳

的《人类历史概论》。在这部著作里，他推荐了一门新的科学，大致和现代文化人类学的精神相同，这门新的科学把各民族的所有习俗作为它的主题，它特别注意研究没有文字的民族。

但是，在十八世纪末叶和十九世纪初叶，出现的某些方法论的和唯理智的论据，对建立一个包括已经发展起来的哲学观点和一般设想的科学是不可缺少的。第一次系统的种族分类，也就是林尼厄斯和约翰·布芦门巴赫的分类，和皮尔特·坎波创始的人体测量标准技术，都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也是在这个时期，现代语言学出现了。在十九世纪，语言在学里占统治地位的基本观点是：语言能够分成为语族，同一个语族的语言又是由一种单一的语言，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发展成许多分支的。这种思想在十八世纪末叶，就由很多作家，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但是，在十九世纪的前五十年代，由于弗朗兹·博普、拉斯马斯·C·拉斯克、雅克布·格里姆和其他人的努力，这种思想就发展成系统的比较法，来复原古代的语言。拉斯克首先指出，承认有关语言中声音相同的规律是非常重要的；一八二二年，格里姆又使这种想法大众化了，并帮助建立了人类文化变化的一般学说。

在这个时期里还出现了显著的发现，这种发现主要是扩大了关于人类发展的时间视野，并给文化是逐渐地发展的观点加了一个注释。一八二一年，琼——弗兰科伊斯·钱普莱昂对于埃及的著作的解释，以及更明显的是，对于石器和金属的基本考古年代的描述（如一八一九年汤姆森的解释），完全与人类纪年传统思想不同。但是，直到一八五九年，著名的地理学家查尔斯·莱尔才承认鲍彻·德珀思的发现：绝种的哺乳动物与旧石器时期的人类工具共存的合法性。因此，

考古学和达尔文学说结合起来了，并在人们面前展现了人类的情景：人类和过去的其他动物一起稳定地定居下来了，并经过了一百多万年更新期中没有文化的类人猿发展而来的。

十九世纪上半叶，人类学开始以一个独特的分支出现。在英国、法国、德国，人类学或叫民族学协会建立起来了。在德国，“文明”以它的现代的含意而成为一个技术术语，E·B·泰勒用他在一八七一年出版的经典著作《原始文化》把文明介绍给了英国人民。泰勒的这本书，详尽地，全面地阐述了在一个主要方面（宗教）里，人类文化的发展，还清楚地叙述了文化科学的理论问题，成为了实际的里程碑（见“泰勒”）。

泰勒的著作，在十九世纪末叶，流行于整个讲英语的国家里，它是人类学最初的代表作，也是文化进化论的代表作。其基本作法——没有任何其他地方象这里描写的这样清楚——叫做比较法。无论在哪个领域，文化的进化都要经历一系列的阶段，早期阶段用民族学的资料记载下来，后期阶段通过历史的资料记载下来，这就导致了十九世纪欧洲的那些机构。因为有些人认为，原始的交配就是婚姻制度的最早形式，所以最早的阶段是假想地推断出来的。生存——方法论的发明物起了突出的作用，也就是，后一个阶段存在的这种制度带有前一个阶段这种制度的原始情况的形迹。因此，L·H·马根推断，因为在夏威夷，被解释为“父系”的亲属关系这个词，不仅是用来表示“父亲”本身，也用来表示爸爸和妈妈的兄弟，在比较早一点的阶段，所有这些人都有可能分别是一个又一个人的爸爸（见马根，刘易斯·亨利）。另外一个基本设想是，人类心理一致。人类特性基本相同，说明即使其地理位置相距很远的民族，也可能在习俗方面有

很多是一致的，而这就是某一个阶段发展的象征。因此，特别是这个学派的后来的成员倾向于用独立的，平行的发展，而不是通过冗长的历史过程，来说明文化的相同性。

德国，在这个阶段里，居人类学领导地位的人物是阿道夫·巴斯蒂恩。在他的主张里很难找到用“阶段”这个词来表示实际的年代顺序，更没有系统地运用比较法。Elementargedanke的关键概念和“心理一致”的概念起着相同的作用，巴斯蒂恩的主要信徒理查德·安德烈的工作主要在于证明这些文化的相同性（详见“巴斯蒂恩”）。

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现了这些占统治地位的倾向的尖锐斗争，到一九一〇年那些对抗力量便占统治地位了。在讲德语和讲英语的这两种国家里，人们把比较法称作推断问题和追就问题的问题，比较法也导致了冲突，为了代替世界各地的习俗所示阶段的系统组合，重点应放在复原一个假想得更为实际的文化历史，这里不同的地区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这里是用传播和迁移的历史过程来解释文化的相同性。在德国和奥地利，系统的方法论发展起来了，它也就是在弗里茨·格雷伯纳和后来在威廉·施米特领导下的文化历史学派Kulturkreislehre的系统方法论。（详见格雷伯纳，施米特）通过应用文化特性相同的标准，人们认为：可能建立很多不同源流的文化，而这些文化在原始时期是相互继承的；并由全世界的迁移所传播的。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里，甚至于更为极端的、单一的文化起源理论出现了，并且还很时髦，例如：泛埃及学论和泛巴比伦学说。

同样，美国在弗朗兹·鲍亚士——美国的专门的人类学的奠基人——的影响下，对文化进化论的批评文反应就是他们的主要论题（见鲍亚士）。他们强调文化历史上，只能用

一个极为有限的规模。他们原来想用文化分类法来达到描述的目的，可不久文化区域也被用作复原历史的手段了。他们用传播来解释包括局限的和不断分布的文化相同性。这样，在某些特定的地区，用这种方法，某些特别复杂的文化历史就可得以复原，并往往表现为：与进化论学说相反，制度是在不同地区按照不同的年代顺序发展的。严格地说，鲍亚士自己的观点还是比较激进的，因为他提出了与根本问题有关的设想，其设想是，在不同地区里的不同文化具有相同的特性。因此，在鲍亚士的鼓励下，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力图表明，图腾崇拜这个标记已用于各种现象。其中，真正心理学的和历史的联系是不可能存在的。（见“戈登威泽”）

象戈登威泽这样的研究，包括了对每一种文化的特殊现象的分析，并把它做为那种文化的一部分。在传播的研究过程中，要被问到的问题，不是这种特有的文化特性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传播，而是为什么被另一个民族接受，而又被另一个民族拒绝；它是怎样被重新解释而又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这样的研究，必然提出每种文化的内部组织原则问题。有一种解答接受了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形式》一书中的古典解释，在这本书里，结合的因素是按照心理术语学来描写的（见“本尼迪克特”）。这方面的兴趣，引起了把人和文化内部相互关系的发展，作为研究的课题之一。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由于功能学说的兴起，这些一般的趋向才得以增长。功能学说的主要阐述者——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一致同意：强调文化特性的，功能的，内部关系的重要性，都轻视历史型的，对文化想象的解释，这种解释代表了先前所有学派。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学说认为，文化构成了有组织的结构。而这种结构，从功